



晚清使臣 “议会书写”研究

余冬林 著

通过对晚清使臣使西日记中的议会记述及其具体语境的分析，力图揭示使臣们各自在不同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等语境下认识和记述西方议会现象。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晚清使臣 “议会书写”研究

余冬林 著

通过对晚清使臣使西日记中的议会记述及其具体语境的分析，力图揭示使臣们各自在不同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等语境下认识和记述西方议会现象。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简 介

晚清中国,置身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逢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晚清使臣是出现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方世界的首批中国使者,他们处于中西文化交锋交融的“前哨”位置。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晚清使臣的议会记述和认知进行系统梳理并加以比较研究,更未对其议会记述和认知的具体语境进行深入而系统的分析研究。鉴于此,本书以考察议会术语变迁为切入点,运用历史文化语义学、比较文学形象学等研究方法,对晚清使臣使西日记中的议会术语及其文化变迁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同时又较为细致地探究了使臣们是在何种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身份认同下进行“书写”的。通过对议会术语和晚清使臣“书写”语境的考察,揭示出晚清使臣使西日记中议会术语的变迁规律,同时凸显出西方议会文化东渐时所遭遇的重塑和变异以及近代国人对其复杂而微妙的心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使臣“议会书写”研究/余冬林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609-9776-6

I. ①晚… II. ①余…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0285 号

晚清使臣“议会书写”研究

余冬林 著

策划编辑:肖海欧

责任编辑:封力煊

封面设计:李 嫒

责任校对:曾 婷

责任监印:朱 玢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3

录 排:武汉楚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 mm 1/16

印 张:12 插页:1

字 数:216千字

版 次:201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6.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近代以降,以汉字承载的中华文化遭遇了一场古今转换、中西互动的大变局;近代新术语的生成与演变则是这一大变局的产物与表征。人们思维的深度拓展,诸学科的建立,皆仰赖新术语的锐意精进。故探讨术语的古今演绎与中外对接,寻觅厘定术语的正途,是诸学科健康成长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王国维曾将“新语之输入”称之近代最显著的文化现象,切中肯綮地指出“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

晚清使臣是中国近代初期首批出使西方、观察西方政教社会的中国士人,他们处在中西文化交会的前哨位置,对西方议会政治及其术语的认知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对西方政治文化的认识和接受程度。“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费正清),通过对议会等政治术语的翻译、改铸以及传播过程进行历史学、文化学的考察,尤其是对语义的古今演绎、中西对接的深度剖析,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近代中国政治学学术演进的真实面貌,有助于把握我国学术体系由传统四部之学向近代七科之学的转变轨迹,是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近代转型的重要切入点,更可以从中窥见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在特定时空下的互动。

置于读者面前的《晚清使臣“议会书写”研究》,是余冬林君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冬林于2009年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正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文化互动研究》。他参与学习并承接子课题,由此注意到晚清使臣的使西日记中,有不少关于西方议会的描述,而议会对应术语及意蕴在不同使臣的笔下多有歧异。目前在晚清使臣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中,亦有涉及其议会记述和认知的,但大多比较简略,论述不够充分,缺乏整体性的把握和观照,留下了进一步深化发掘的空间。冬林选题即由此而兴。

历史文化语义学之要义,不止局限于对语义作历时性研究,它还要求开掘语义变化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冬林运用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晚清汉文西书中议会术语和议会文化内容

变迁之梳理和分析。二是对晚清使臣使西日记中的议会记述及其具体语境的分析,力图揭示使臣们各自在何种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身份认同等语境下认识和记述西方议会现象的。从历时性角度考察议会术语使用频率及变迁,又从价值观、思维方式、现实环境、个性品质、精神诉求等方面探讨使臣“议会书写”之具体语境,这正是此著的创新之处。

此外,作者还关注到:晚清使臣跨出本土的囿限观察西方世界,既存在自身的传统时间层面与所到之处的当下时间层面的纠结,又存在空间转移所带来的对中西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复杂比较和参照。诸使臣虽然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别,但是都没有真正接受近代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洗礼,并未形成接受西方民主制度的认知框架。晚清使臣所秉持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功利态度等使得他们对西方议会的现代性体验复杂微妙。是著对此作了细致的揭示。

冬林勤勉且善于思考,历时数年完成这部难度较高的专著,颇为不易。然因学识和时间的局限,其观点论断多有可议之处,如对晚清使臣议会记述的材料运用和整体把握仍有不足。《诗经·敬之》云:“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我们期待作者以更谨严的态度为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作品。

冯天瑜

2014年12月2日于武昌珞珈山

绪论	(1)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0)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3)
三、研究动机、方法和内容	(17)
第一章 西政思想之东渐与嬗变	(21)
第一节 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	(21)
第二节 主要汉文西书和使西日记中议会之变迁	(27)
一、主要汉文西书中议会之变迁	(27)
二、主要使西日记中议会之变迁	(36)
三、议会术语的变迁与定型	(47)
第二章 议会之初识	(57)
第一节 斌椿笔下的议会	(58)
第二节 志刚的议会记述	(64)
第三节 张德彝七种“述奇”中的议会	(72)
一、《航海述奇》系列中的议会记述	(74)
二、“各国皆有善政美俗”	(82)
第三章 “民本”视角下的议会观照(一)	(91)
第一节 郭嵩焘使西日记中的议会	(91)
一、《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的议会记述	(92)
二、“夷夏观”的颠覆与议会的认知	(97)
第二节 刘锡鸿使西日记中的议会	(105)
一、《英轺私记》中的议会记述	(106)
二、传统“本末论”与议会印象	(110)
第四章 “民本”视角下的议会观照(二)	(119)
第一节 薛福成使西日记中的议会记述	(120)
第二节 “化西为古”心态下的议会认识	(125)

晚清使臣议会书写研究

一、泰西诸国人心风俗醇厚	(126)
二、君民共主之制“颇称尽善”	(126)
三、“民主”、“君主”利弊关键在于“得人”	(128)
四、夏、商、周“犹今之君民共主之政”	(129)
五、“用夏变夷”和“西学中源”	(130)
第五章 以维护皇权为鹄的议会载记	(136)
第一节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中的议会	(137)
一、《出使九国日记》中的议会记述	(137)
二、戴鸿慈的议会印象	(143)
第二节 载泽《考察政治日记》中的议会	(148)
一、《考察政治日记》中的议会记述	(149)
二、“用极”判断下的议会认知	(156)
第六章 传播与影响	(163)
第一节 议会书写的传播	(163)
第二节 议会书写的影响	(169)
结语	(174)
参考书目	(179)
后记	(185)

绪 论

在此前的研究中,“驻外使节”、“驻外公使”、“驻外使臣”等概念均见使用。所谓“使节”,是指由一个国家派驻在另一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或由一个国家派遣到另一个国家去办理事务的代表。^①由此可知,使节应包括出使大臣、参赞、领事等全部外交人员。本文的研究以使臣为主,兼及其他使节。这里的“使臣”即是指晚清官方文献中所谓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出使大臣”等。

研究晚清使臣,不能不对晚清外交制度和外交思想的嬗变作一必要的梳理。西方的外交制度于19世纪初已臻于成熟。而中国迨至鸦片战争尚无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更遑论近代外交制度。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与朝贡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所谓的外交制度就是“朝贡制度”。“朝贡制度”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的产物。古代中国人称世界为“天下”,自己的国度则为“天朝”,“天朝”处于“天下”的中央。在他们的观念中,周边四方都是些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在“天朝”的德化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中国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文化上均居于“天下”的中心地位。因此,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就被置于宗主国和藩属国的框架之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古代“五礼”之一的“宾礼”来维系的。宾礼的内容主要是朝聘之制。它包括“番国朝觐制度”、“遣使册封制度”。所谓“番国朝觐制度”,是指番国使节携带该国所产的进贡礼物(方物),按照规定的年限(贡期)和规定的地点(贡道)入华朝觐天子。在京城,番国是不准自设使馆的。所谓“遣使册封制度”是指清政府派遣一正一副两名使臣,持节出使番国举行册封大典,番国君主须对天子之敕谕行三跪九叩之礼,其地位的合法性由此而得以确认。在这种体制之下,根本没有在其他国家设立使馆之必要。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人既不理解西方列强遣使驻京的要求,亦不理解中国派遣驻使的意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41页。

义。在传统惯例之中,天朝“原则上只有对藩属国‘册封’的遣使而已”^①。如果不是出于此种目的,那么就意味着屈辱和有伤国体。因此,互派使节这种近代外交最起码的运作形式,在晚清中国实施起来格外艰难。

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旧有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传统的朝贡体制被打破。虽然中国有意对朝贡体制加以“保存并维持”^②,但是条约的签订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事务的某些方面采取与过去不同的方式。^③“不幸的是当时的对外态度强调文化意识,尤其着重在夷夏之防。严格分明界限,再加上文化的优越感,心理上形成深闭固拒,而自我蒙蔽对他人的了解,不免真正成为盲目自大。无可否认,当时朝野官绅对外的轻视倾向,大过一切的对外态度。”^④尽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主权遭到了削弱,但是依然将欧美列强视为“外夷”。正如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言,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导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⑤同时,西方列强并不满足于五口通商,它们要求中国开放全境通商,在北京设立使馆等。其中公使驻京一项直接威胁到传统的朝聘制度,这自然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于是,列强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破除了以夷夏之防为核心的朝聘制度。其实,西方列强对朝聘制度的冲击早在《南京条约》中即有所体现。该条约规定,在官方的外交文书中废止使用外人认为的那些“歧视性”用语,如带有“禀”、“藩”、“夷”等字样的表述。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⑥。

随着西方列强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清政府认为成立一个专门处理对外事务的中央机构已势在必行。经恭亲王奕訢奏请,于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西方列强欣见中国的改革,逐渐以“合作政策”取代了此前的“炮舰外交”政策,这便成为引发中国遣使驻外的环境诱因。^⑦

早在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之时,英方表示,希望清政府向英国派出

① 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②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陈鹏仁等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3-154页。

③ 任天豪:《清季使臣群体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载《“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④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⑤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⑥ 褚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⑦ 任天豪:《清季使臣群体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载《“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使节。^①在清政府使节正式派驻西方之前,各国的类似表态和努力几乎没有间断。1865年11月6日,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向总理衙门提交了题为《局外旁观论》的备忘录,声称“派委大臣驻扎外国,于中国有大益处”^②。同年,供职于英国公使馆的代办威妥玛也向总理衙门提交了题为《新义略论》的建议书。他指出,今日之外国人与昔日诸如匈奴等夷狄迥然不同,委派驻外使节可以使政府之间感情融洽,还能预防纠纷。^③恭亲王奕訢在议奏遣使驻外时提到,“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藉资筹计”^④。可见,探查他国情势、节制驻华使节,乃是清政府遣使驻外的内在原因。

虽然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了外国公使驻京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中国有权派遣驻外使节,但因清政府缺乏近代外交意识,对通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再加上经费、人才的短缺以及外交礼节等问题,派遣驻外使节之事一拖再拖。西方列强为了巩固其在华不平等条约制度,竭力劝说清政府对外遣使,以实现外交关系的平衡。1875年马嘉理事件发生,促成了郭嵩焘出使英国。1875年8月,清政府任命郭嵩焘、许铃身(后改为刘锡鸿)为出使英国的正、副使。同年12月,又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正、副使。翌年9月,又调原为驻英副使的许铃身为驻日本正使(后因丁忧未赴任),并派翰林院编修何如璋为副使(后升正使,副使由张斯桂担任)。这样,首批三个驻外使馆被确定下来。1876年,清政府规定了出使人员的俸薪,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对驻外使节的任期、使馆的编制和经费的使用等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⑤1877年1月—1878年9月,清政府先后在英、德、日、俄、美等国建立了驻外使馆。

1875—1911年,清政府实际派出常驻公使58人,期间共入驻16个国家,而且大多数为一人兼摄数国使节。1895年之前,使节制度还处于创建阶段,因此派出的使节数量较少,任职时间较长。派驻12个国家的22位公使(署理公使及未成行者除外)大多数为思想比较开明的洋务专家,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要比当时大部分官僚士大夫多一些,但无人受过正规的外语和国际法训练,仍然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润和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外交

① 褚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 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133页。

② 宝璜:《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第10页。

③ 宝璜:《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第29页。

④ 宝璜:《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清内府抄本,第1页。

⑤ 葛士澐:《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4),上海图书集成局1888年版,第3-4页。

使臣只是一个临时差事，一般并非实官。这与甲午战争后近代使节制度纵深发展阶段的外交官格局（以接受专门教育而成长起来的职业外交官为主体）大不相同。^① 自郭嵩焘出使至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共计在 16 个国家遣使驻节。其中有些国家并未专派公使，而由驻其他国家使臣兼任。现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将晚清驻外使节出使国家、谕命出使时间等勒成下表（见表 0.1）。

表 0.1 晚清驻使出使概况一览表

姓名	出使国别	谕命出使时间(年)	备 注
郭嵩焘	英国、法国	光绪元年—四年(1875—1878)	光绪四年正月—七月 兼驻法国
曾纪泽	英国、法国、俄国	光 绪 四 年—十 一 年 (1878— 1885)	光绪四年七月—十年 四月兼驻法国，光绪六 年—十一年六月兼驻 俄国
刘瑞芬	英国、俄国	光 绪 十 一 年—十 三 年 (1885— 1887)	光绪十一年六月—十 三年五月兼驻俄国
	英国、法国、 意大利、比利时	光 绪 十 三 年—十 五 年 (1887— 1889)	
薛福成	英国、法国、 意大利、比利时	光 绪 十 五 年—十 九 年 (1889— 1893)	
崇 厚	俄国	光绪四年—五年(1878—1879)	
洪 钧	俄国、德国、 意大利、奥匈、荷兰	光 绪 十 三 年—十 六 年 (1887— 1890)	
许景澄	德国、奥匈、 荷兰、比利时、 意大利	光 绪 十 年—十 三 年 (1884— 1887)	光绪十年四月兼驻法 国、意大利、荷兰、奥匈， 十一年兼驻比利时
	德国、俄国、 奥匈、荷兰	光 绪 十 六 年—二 十 二 年 (1890—1896)	
	德国	光 绪 二 十 二 年—二 十 三 年 (1896—1897)	

① 祖金玉：《早期驻外使节对晚清经济变革的贡献述论》，载《史学集刊》1999 年第 1 期，第 32 页。

姓名	出使国别	谕命出使时间(年)	备 注
龚照璦	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	光 绪 十 九 年—二 十 二 年 (1893—1896)	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一年六月兼驻法国
刘锡鸿	德国	光绪三年—四年(1877—1878)	光绪二年八月—三年二月任驻英国副使
李凤苞	德国、奥匈、荷兰、意大利	光绪四年—十年(1878—1884)	光绪十年四月—七月兼驻法国
何如璋	日本	光绪三年—八年(1877—1882)	
黎庶昌	日本	光绪七年—十年(1881—1884)	
		光绪十三年—十六年(1887—1890)	
徐承祖	日本	光 绪 十 年—十 三 年 (1884—1887)	
汪凤藻	日本	光绪十八年—二十年(1892—1894)	
陈兰彬	美国、西班牙、秘鲁	光绪元年—七年(1875—1881)	
郑藻如	美国、西班牙、秘鲁	光 绪 七 年—十 一 年 (1881—1885)	
张荫桓	美国、西班牙、秘鲁	光绪十二年—十五年(1886—1889)	
崔国因	美国、西班牙、秘鲁	光绪十五年—十八年(1889—1892)	
杨 儒	美国、西班牙、秘鲁	光 绪 十 八 年—二 十 二 年 (1892—1896)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免兼驻荷兰
	俄国、奥匈、荷兰	光 绪 二 十 二 年—二 十 八 年 (1896—1902)	
罗丰禄	英国、意大利、比利时	光 绪 二 十 二 年—二 十 七 年 (1896—1901)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调驻俄国,未就任
张德彝	英国、比利时、意大利	光 绪 二 十 七 年—三 十 一 年 (1901—1905)	光绪二十八年免兼驻意大利、比利时

姓名	出使国别	谕命出使时间(年)	备 注
汪大燮	英国	光 绪 三 十 一 年—三 十 三 年 (1905—1907)	
	日本	宣 统 二 年—宣 统 三 年(1910— 1911)	
李经方	英国	光 绪 三 十 一 年—宣 统 二 年 (1907—1910)	
	日本	光 绪 十 七 年—十 八 年(1891— 1892)	
刘玉麟	英国	宣 统 二 年—三 年(1910—1911)	
胡惟德	俄国	光 绪 二 十 八 年—三 十 三 年 (1902—1907)	
	日本	光 绪 三 十 四 年—宣 统 二 年 (1908—1910)	
萨荫图	俄国	光 绪 三 十 三 年—宣 统 三 年 (1907—1911)	
李国杰	比利时	宣 统 三 年(1911)	
邵友濂	俄国	光 绪 五 年—六 年(1879—1880)	
庆 常	法国	光 绪 二 十 一 年—二 十 五 年 (1895—1899)	
裕 庚	法国	光 绪 二 十 五 年—二 十 八 年 (1899—1902)	
	日本	光 绪 二 十 一 年—二 十 四 年 (1895—1898)	
孙宝琦	法国、西班牙	光 绪 二 十 八 年—三 十 一 年 (1902—1905)	光 绪 二 十 九 年 兼 驻 西 班 牙
	德国	光 绪 三 十 三—三 十 四 年 (1907—1908)	
刘式训	法国、葡萄牙、 西班牙	光 绪 三 十 一 年—宣 统 三 年 (1905—1911)	

姓名	出使国别	谕命出使时间(年)	备 注
吕海寰	德国、荷兰	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七年 (1897—1901)	
阴 昌	德国、荷兰	光绪二十七年—宣统元年 (1901—1909)	
杨 晟	德国、奥匈	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 (1905—1906)	
伍廷芳	美国、秘鲁、 西班牙	光绪二十二年—二十八年 (1896—1902)	
	美国、墨西哥、 古巴	光绪三十三年—宣统元年 (1907—1909)	
梁 诚	美国、秘鲁、西班牙、 墨西哥、古巴	光绪二十九年—三十三年 (1903—1907)	
	德国	宣统二年—三年(1910—1911)	
张荫棠	美国、秘鲁、 墨西哥、古巴	宣统元年—三年(1909—1911)	
李盛铎	日本	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七年 (1898—1901)	
	比利时	光绪三十二年—宣统元年 (1906—1909)	
蔡 钧	日本	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九年 (1901—1903)	
李家驹	日本	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 (1907—1908)	
杨 枢	日本	光绪二十九年—三十三年 (1903—1907)	
	比利时	宣统元年—二年(1909—1910)	
吴德章	奥匈	光绪二十八年—三十年 (1902—1904)	
李经迈	奥匈	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三年 (1905—1907)	

续表

姓名	出使国别	谕命出使时间(年)	备 注
雷补同	奥匈	光绪三十三年—宣统二年 (1907—1910)	
沈瑞麟	奥匈	宣统二年—三年(1910—1911)	
钱 恂	荷兰	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 (1907—1908)	
	意大利	光绪三十四年—宣统元年 (1908—1909)	
刘镜人	荷兰	宣统三年(1911)	
杨兆璩	比利时	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二年 (1902—1906)	
许 珏	意大利	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二年 (1902—1906)	
黄 诰	意大利	光绪三十二年—三十四年 (1906—1908)	
吴宗濂	意大利	宣统元年—三年(1909—1911)	
徐寿朋	朝鲜	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七年 (1898—1901)	
许台身	朝鲜	光绪二十七年—三十一年 (1901—1905)	
曾广铨	朝鲜	光绪三十一年(1905)	

注：西班牙当时称“日斯巴尼亚”，故晚清文献中称其为“日国”。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驻外使节大致以甲午(1894年)为界，形成两种组成形态，其差异表现在功名出身、过往经历以及人际网络三个方面。甲午之前，仅光绪元年(1875年)担任使美副使的容闳及光绪十八年(1891年)使日的汪凤藻二人为西学教育出身，其余皆为接受传统中国式教育的人士。可见，甲午以前，并未将“西学背景”视为使臣的必要条件。这一时期的使臣，仍有一半以上具有科甲身份。甲午之前，21位使臣中，出使前尚无明确经办国内洋务经验者，只有6人。由此可见，清政府无论是在使臣的任用上，还是派使的实际执行上，均有注重使臣的洋务经历(或认识)这一倾向。因重视洋务经验，故其人际网络有着明显的“洋务派”色彩，特别是出自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系统者，比重超过3/4。这一时期湘、淮系统主导遣使的

原因,应是在规划遣使初期,清政府规定出使大臣的人选,乃为“在京王公大臣等保举熟悉洋情、边防之员,兼备出使简用”而决定。^①甲午战争使中国的对外关系面临新的局面。甲午之后,中国的东亚首强地位被日本取代,兼之越南、朝鲜的先后失去,使传统的朝贡体制更为难行。于是,清政府的遣使内容,也在甲午以后发生变化。甲午至清亡仅16年,受命为使臣者便达42位,实际派出者亦有37位之多。在这一时期,实际派遣的使臣中,全无西学背景者为18位,比重略降为五成,而科甲者在所有传统士人中的比重也为五成。可见,此时中国的科甲精英投身外交的行动,较甲午之前更为积极。使臣过往经历的组成,特别是洋务经历的重要性,已为出洋经历所取代。受谕命的42位使臣中,至少有24位曾有外馆经历。在使臣的人际网络上,亦与前期差异颇大。前期3/4以上的使臣出自曾、李幕府,但此时出自李鸿章幕下者,仅余16人,比例在四成上下。而此期使臣功名出身、过往经历与人际网络的组成情形,均大异于甲午以前,兼之其群体常对国事有一致看法,又有来自内部的力量自发性地折冲,显见其群体结构已然改变,与甲午以前相比,可谓形成了一个新的“世代”。此一世代虽因外交艰困及清政府的日益衰弱,显现出浓厚的过渡性质,但至少淡化了前期使臣群体的传统性。^②

关于这一时期的外交思想,亦有必要作一简要的概述。在传统的夷夏观念逐步走向瓦解时,“天下一家”的观念起到了一定的弥合作用。“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礼宾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③就外交范围而言,这种“四海皆兄弟”的观念,一直支配着中国的外交理论。^④就外交态度而言,晚清人士从历史传统中汲取诚信的原则。如曾国藩曰:“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⑤晚清主持外交者始终能维持其最坚定的立场“和戎”的原则。如李鸿章曰:“至百战百胜,未若不战而胜,尤为驭外良谟。”^⑥曾国藩则曰:“承示御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⑦可见,传统政治外交重义轻利、重视羁縻怀柔,即便是关系国家利权的“关税”,亦被视为不争的“小者”。在近代外交过程中,清政府往往秉持传统的对外观念来应对西方列强的强

① 王亮:《清季外交史料》(一),文海出版社1931年版,第14页。

② 任天豪:《清季使臣群体的变迁及其历史意义》,载《“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③ 魏源:《海国图志》(下),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889页。

④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⑤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648页。

⑥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吴汝纶编,金陵书局1905年版,第10页。

⑦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3),传忠书局1876年版,第10页。

晚清使臣议会书写研究

权外交,给国家利权带来巨大损失!^①

值得一提的还有晚清朝野有识之士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认识,即所谓的“变局观”。最早将“变局”二字行之于文字的是黄钧宰。1844年秋,他在《金壶七墨》中用“古今之变局”一语来概述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19世纪60年代中期后,晚清朝野论及时局,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变局”这一词汇。1872年,李鸿章上疏道:“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史前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②通过对晚清半个世纪文献的统计,我们不难发现,“变局”的认识实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对时代环境的固定观念。^③

此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朝野逐渐意识到中国不仅不是地理上的天下之中心,亦不是政治上的天下万邦之宗主。晚清人士不免将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与春秋战国之世相比附,如冯桂芬曰:“今海外诸夷,一春秋列国也,不特形势同,即风气亦相近焉。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譎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凌弱,而必有其借口之端。”^④这种比附在晚清使臣志刚、张德彝等的使西日记中亦有所体现。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目前,晚清使臣研究已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虽然对不同的使臣研究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总体而言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晚清使臣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所作的贡献逐渐为人们所关注。西方议会文化的东渐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方维规的《“议会”、“民主”与“共和”概念在西方与中国的嬗变》、刘宗珍的《议会在中国的兴起——清末民初议会制度的宪政解读》以及张朋园的《议会思想之进入中国》和《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论文或专著都对这一问题有所阐述。不过,在研究晚清使臣的著述中,虽然对他们的议会观察和认识有所涉及,但是大多比较简略,论述亦不够充分,缺乏整体性的把握和观照。而研究议会东渐的著述虽然亦会提及晚清使

①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吴汝纶编,金陵书局1905年版,第44-45页。

③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